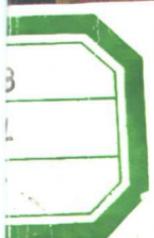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化纵横谈/中国古代
文化纵横谈
《衣冠沧桑》
骆新 姚莽著

衣
冠
沧
桑



农村读物出版社

衣冠沧桑

——中国古代服装的文化观

骆新 姚莽 编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1991·北京

衣冠沧桑

骆新 姚莽 编著

责任编辑 马春辉

*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河北衡水红旗印刷厂 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

*

787×1092 毫米 1/36 6 印张 100 千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衡水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

ISBN 7-5048-1523-3/G·443 定价：3.00 元

引子

人的毛发和脚趾，是人身体的一部分，原同文化、特别是政治毫无关系，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在社会大变动中，中国人的头和脚却一再蒙受着重重的灾难，尤其是近几个世纪，单是由于留辫子和剪辫子，就有无数的人莫名其妙地送了命。清政府以处死来强制汉人髡发留辫。剃头挑子上挂着人头走街串巷，要么剃头，要么砍头。那由汉人发明的将人头挂在城门上示众的法子，被清人发展了一步，变成流动的悬头示众，而且递上门来，滴水不漏。中国男人头上的那一根辫子是有无数冤魂缠绕而成，它曾经是随身携带的纪念碑，不断地昭示着中国人的命运。

衣裳本来是人类用以御寒御热保护肌肤不受损害的东西，也同文化特别是政治毫无关系。但是曾几何时，头发成了国旗似的政权归属的标志，衣

变成了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甚至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它意味着身份，它象征着皇权。某一种颜色为某一阶层的人乃至某一个人所垄断；某一种式样为一阶层乃至某一个人所独有。请读者随便翻翻中国的辞书，有多少同衣饰有关而有强烈文化色彩的字眼。先秦的百姓不许戴“冠”，所以就为后世留下了对于老百姓的专称——“黔首”。由于只许老百姓穿麻布粗衣，素色不染，于是又为后人留下了另外两个对于老百姓的称呼——“布衣”和“白丁”。与之相对，绫罗绸缎只有贵族才能享用，于是贵族少爷便被叫做“纨绔子弟”。“凤冠霞帔”，一定是贵妇人；“顶戴花翎”，一定是官老爷。“黄袍加身”意味着做皇上，“袍笏登场”意味着官运亨通。中国的老百姓那一个不知道“乌纱帽”？这本来不过是一件衣物，而演化为“官”的同义语。直到今天，“保乌纱帽”和“丢乌纱帽”这样的说法还活在中国人的口上。

在中国人身上，灾难特别深重而又持久的莫过于妇女的脚。当我们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再一次试图找到妇女缠足的“始作俑者”，然而我们没有成功。但是，我们发现，妇女缠足是同中国封建文化的由盛而衰同步的。在把妇女的脚裹上的同时，中华民族把脚也裹上了，中国的文化也把脚裹上了。在本世纪初的反封建的伟大运动中，中国妇女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历史加于她们的屈辱和酷刑。中国的男

人也开始背弃他们先辈迫使女性缠起脚来，并且以畸形为美的丑恶变态心理。反对缠足成了呼唤新时代的先声。单是这一现象就充分表明，妇女缠足是中国封建文化永远难以赎清的罪孽，是至今令人惊讶不止的历史的遗憾。虽然我们已经距离五四运动快一个世纪了，当我们接触这一话题的时候，仍然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妇女缠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很值得探讨的，其影响之大可能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我们这本小册子不是一本关于服饰的理论著作，也不是一本服饰史。我们只是选取服饰中几个有意思的题目，和读者一起回过头去看一看，有些事情不少读者可能是并不熟悉的。由于对于历史情况的不熟悉，往往使人陷入盲目之中。鲁迅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讲到“胡子”，因为当时有人认为八字胡是东洋玩意儿，他说其实这八字胡倒是中国古已有之，秦代的臣民们的胡子就是这种式样。鲁迅说这话的时候，秦兵马俑还没有出土。今天我们有幸看到的兵马俑完全证实了鲁迅的说法。

应当说，直到近几年实行开放政策以前，中国人对于服饰的态度是偏于守旧的。因此也就难免“蓝色汪洋”之诮。反对“奇装异服”，反对烫发，强制剃头，剪穿喇叭裤的裤腿，美国西部放牛娃穿的裤子传到中国就被好一阵子当作腐朽的资本主义货

色而加以排斥——这都是不久前发生过的事情。

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的上千年时间里，中国人没有选择服饰的自由，这绝非歪曲历史和耸人听闻。那么，一个不留辫子就要掉脑袋，生下来就得把脚生生缠成畸型，穿什么式样、什么色彩的衣服都要由中央政权一一加以规定，强制遵守的民族，其民众的自由度是很可想象的。

服饰具有生理的和文化的双重意义和价值。服饰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已经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了。服饰的文化意义和服饰与整个文化系统的关系，我们在这里难以论述，但通过历史事实会为读者提供进一步思索的材料。

读者看完这本书，会很自然地意识到，服饰是演进的、变化着的，而且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不管历史上这种变化是通过主动地学习，如“胡服骑射”，还是通过暴力强制推行，如清朝政府作过的那样。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成不变，千载如一的所谓“传统服饰”。——这是读者和我们都会作出的判断。

目 录

引 子

第一章	挑着人头去剃头的奇观	
	——从“留发不留头”说开去 (1)
第二章	“君子死，冠不免”	
	——发冠小史 (12)
第三章	“垂衣裳而天下治”	
	——衣履春秋 (36)
第四章	“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	
	——等级制度的投影 (65)
第五章	了不起，赵武灵王	
	——从“胡服骑射”到“唐人大有胡气” (105)
	附：鲁迅《说胡须》 (139)

第六章	最后一个王朝的故事 ——“长袍马褂”与“传统服装” 的终结	(146)
第七章	“为什么事裹了足” ——缠 足	(180)
后 记		(203)

第一章 挑着人头去剃头的奇观

——从“留发不留头”说开去

历史在掀开新的一页时，往往是极富悲剧性的。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甲申，就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悲剧性年头。同“崇祯”年号相比先后的有爱新觉罗·福临的“顺治元年”、李自成的“永昌元年”、张献忠的“大顺元年”……一场中原逐鹿、生灵涂毒的大戏已演到高潮。

该年春正月初一庚寅这个“万象更新”的日子里，作为明朝发祥地的安徽凤阳发生地震，而帝都北京狂风大作、阴霾漫天，据卜卦者说，这是“暴兵破城”的征兆。三月十九日，李闯王的“大顺军”自彰义门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凄凄惶惶地在景山（时曰煤山）寿皇亭上“自去冠冕，以发覆面”地上了吊。四月，一片石（现抚宁东北）一役中李自成又被

已降清的故明辽东总兵吴三桂军打得大败，这支农民的狂飙仅占据北京一个月便仓皇撤走了。五月，清摄政王多尔衮带着剽悍的八旗军队在吴三桂的导引下顺顺当当地进了北京城——女真人的后裔实现了先辈几百年“入主中国”的梦想。

上天毫无悯恤的意思，无论汉人们如何泫然久之，但事实清清楚楚地宣布：他们再度受制于人。不过，话又说回来，面对一派比东北老家广袤原野还要辽阔得多的国土、明朝遗留下的数以千万计的黎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辉煌的文化，努尔哈赤父子几十年苦心孤诣的成绩倏然黯淡了，就在小皇帝福临的卤薄车仪浩浩荡荡向北京紫禁城进发的时候，布库里雍顺的子孙们心中肯定也是不无忐忑的，因为他们意识得到：他们要去统治的是一个人口十数倍于自己，一直把他们蔑称为“满鞑子”的民族！

清兵自山海关入控直隶，招降工作很顺利，几乎是未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五月朔，多尔衮设金瓜玉节于武英殿，在此接受了故明大小官员和宦官七八千人山呼“万岁”的朝拜，踌躇满志。这位很富韬略的军事首脑一面安定民心，禁土卒抢夺，并“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一面命“京畿人等，一律革发易服”，在他发往京外各县的招降檄文中，所提要求亦是“削发投顺，开城纳款”。

“革发”便是剃头。众所周知，汉族男子自古是

蓄发绾髻的，据说此俗源于孔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之训。满人的风俗，是男子之发“半剃半留”，即于额角两端引一直线，将此线前之头发尽数剃去，只留颅后头发编成辫子。这是因循其祖先肃慎、女真的旧俗。

《晋书·肃慎传》中曰：“俗皆辩发。”《唐书·靺鞨传》亦说：“俗编发。”清人俞樾作《曲园杂纂》引宋璿《建炎德安守御录》谓：“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北来一项群贼数万人，皆剃头辩发，作金人装束。”“金人”就是女真族人，《北风扬沙录》称：“（女真）人皆辩发……耳垂金环，留颅后发，以色丝系之。”

多尔袞下薙发令，无非也是因循了一下律令上的习惯。他的父亲努尔哈赤 1616 年正月壬申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政权以后，长期与明朝征战，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以后，明在辽东的军事实力日渐衰微，失城丧地甚多，为便于辖制征服地区的汉人，努尔哈赤屡次强调：“凡归降诸城一律薙发……凡辽河以东未曾薙发归顺诸城，朕本拟河水即合乃往攻取。”（《汉译满文老档拾零》）既然薙发与否已成是否顺降的标志，所以山海关吴三桂与李自成交战时，“即于军中剃发设誓”，而在此之前降清的明将如孔有德、耿仲明、祖大寿、洪承畴等人都自行剃发以表忠心。京东州县迎降时也是“剃发于上

下”，据多尔袞本人的诠释：“虽称归顺而不薙发者，是有狐疑观望之意。”但那时薙发只在局部地区施行，并未引起大的波动。汉民族自古以来是很看重“夷夏之防”的，何况一种风俗的形成，多仰赖于潜移默化，毋须强制，“如果不是在民族间和平共处的情况下互相吸取各自风俗习惯的长处，摈弃各自的短处，而是征服者用野蛮的高压手段来强迫被征服民族接受其风俗习惯，那么对于被征服民族来说，或许本来无所谓风俗习惯，此时却在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反抗——因为他们把这当成民族压迫和征服的标志。”（周远廉、赵世瑜《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袞全传》190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薙发令刚一颁发，京畿各地便纷纷怨声载道了，连当时的朝鲜官员都就北京城“人人剃头”之事评论说：“如此之事，虽似决断，非收拾人心之道也。”（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734页）多尔袞见状，生恐在大兵初入中原，立足未稳之时祸生肘腋，便在五月二十三日敕谕兵部让“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庚戌）。

这样一来，人心稍定，不少地方的军民竟欢呼雀跃起来，喜孜孜地庆幸自己保住了祖宗的积习。

可是，好景不长，一年之后，豫亲王多铎率领的

征南大军，把南明弘光小朝廷的负隅顽抗打为齑粉，弘光帝朱由崧被生擒，阻碍清廷问鼎的重要势力被清除了，于是，清廷首脑们这下可不客气了。

据《多尔袞摄政日记》载：“最近我读官员的章奏，很多人多次用礼乐制度为根据来反对剃头。本朝怎么没有礼乐制度啊？如今不遵本朝制度，那就是要遵明朝的制度——是何居心？要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还说得过去，要总是说什么礼乐制度，就说不过去了。我一向怜爱群臣，所以听其自便，不愿剃头的并不勉强，如今老是这么说，就该传旨叫全体官民一律剃头。”

果然，不几日——顺治二年六月丙辰，多尔袞以顺治帝的名义差遣尼雅达、费扬古去南京慰问多铎，传旨：“江南之定，皆王与诸将同心报国所致，各处文武军民，自应尽令薙发，倘有不从，军法从事。”（《清世祖实录》卷十七）同年丙寅，又谕礼部，声称“向来薙头之制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也”（蒋良骐《东华录》卷五，顺治二年六月），既然天下现在已经平定，君就象父，民就象子，“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统一，终属贰心。自发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薙发。遵依者为吾国之民，迟疑者为逆命之寇。若惜发规避，巧辞争辩，决不轻贷”。并叫各地文武官员要严加察验，谁有为此事再上疏企图让已安定的地

方百姓仍做明朝发式的，杀毋赦，衣帽装束可以逐渐改变，但是头发必须在十天之中都剃成“本朝样子”（《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雍发之令”。这可以说令所有的汉人都很难堪，因为降清固使人痛心，但某种“以夏化夷”的念头尚可“减痛三分”，剃发从满，却意味着他们的血统将属于一个他们所不齿的“蛮族”，明朝的遗老遗少，“无不椎心饮泣，挺螳臂以挡车”。

例如一位叫孔文漂的知府便疏奏说，我家是孔子之后，现在的衍圣公已遵旨剃了头，可我考虑先圣孔子是礼乐之宗，其发冠衣束“自汉及明三千年之久，未之有改，一旦变更，恐非崇儒重典之道”，能否允许我们孔氏家族的人蓄发？——这位倒楣的圣人后裔使得多尔袞很不痛快，乃传谕“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姑念圣裔，免死革职”。

更多的汉人并不象孔文漂这样文质彬彬，他们的反抗是直接诉诸暴力的。一些人评论多尔袞的剃发令是他政治上的一大蠢举，因为清军的南下已经打破了南明缙绅联清抗闯的美梦，朱由崧虽被俘获，可明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唐王朱聿键于福州称帝，民族矛盾尖锐已极之时，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其实，多铎兵入南京，有李乔剃头易服，还被多铎大骂了顿，并告示于城门，曰：“剃头一事，本国相

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四）这样，南京城内外才稍稍安定下来，就是兵进苏杭，也没引起什么恐慌，据吴伟业《鹿樵纪闻》的说法：“东南郡邑，一时帖然，犹若不知有鼎革之事者。”可是，一纸雍发令，遍地起干戈。雍发令到嘉兴，先前还“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顺民”们，一下子哄然大乱，跑到原明总兵陈梧官署请求，陈梧说：“剃头小事，但剃后，汝等妻子俱不保。”民更哗然，竟杀了清朝府尹胡之臣。令至嘉定，远近乡兵不约而起，逐走县令张维熙，侯峒曾、黄淳耀等趁机举旗反清，城中军民与清将李成栋力拒，最后城破被杀者不计其数（此城先后被清兵屠戮三次，史称“嘉定三屠”，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有文证）。令至江阴，百姓勃然奋起，高呼：“头可断，发不可去！”竟与清军相持八十三天，亦被屠城，其他如常州、无锡、宜兴、常熟、昆山、松江、绍兴等地，都有百姓反对剃发，一些明朝“忠义”如陈子龙、夏允彝、吴胜兆、卢象观、金声、江天一、吴应箕等俱以此为名，打出恢复大明的旗号，一时江南兵戎不断，死者甚众。

一位外国传教士在当时记述说：“鞑靼人对服装和头发的式样要求很严格，谁不接受这种装束就被判为最大的叛国罪。这个法律多次使他们陷于危

险，打乱了他们整个计划。中国人为保护他们的头发和服装所表现出的悲愤和战斗勇气，甚于保护国家和皇帝，他们往往宁愿掉脑袋，也不愿遵从鞑靼风俗。”（卫匡国《鞑靼战纪》）这种记述是一点也不夸张的。顺治三年三月初一日的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上疏，也可以说明尽管多尔袞严禁百官进谏反剃发，“冒死者”仍然大有人在，吴达认为：“一年之间，中原归顺比风还快，而以后却到处受阻，朝廷只看到人心叵测，应该诛杀，不知道百姓再傻也不会自己找死，实在是政府对民情调整理不够，最初就是剃发一事。顺治元年皇叔父摄政王下令薙发，已经是大拂民情，绝对不是以文教治天下的意思。……等到这次薙发诏书一下，全国人民都饮痛悲泣，住城市的忍死曲从、住乡村的抱头窜匿，一些人就此为号召，发动人民起义，所以没有寇来却有许多人上城抵抗。……见去年六月以前，倾心归顺者何其多！以后则形势一变。由此而言，危机灾祸之始，实自上面而开，并非由百姓而来。”（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转引自《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袞全传》）

至于为什么要薙发，民间流传这样一种说法

清朝刚刚入关的时候，汉官衣履穿着都可依明朝式样。前明降臣都束发，戴进贤冠，宽袍大袖，并没人责难他们。于是，每逢上朝，丹墀上便依服装自